

在文化批判中熔铸新的文化精神 ——夏英勇散文艺术论

范培松

(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夏英勇散文坚持背靠历史, 直面现实, 站在民间立场上建造“文化法庭”, 进行文化批判。他是一个文化悲情主义者。就艺术特色而言, 表现为: 古今时空交叉的纪实创作惯性, 以现代意识熔铸新的历史文化品位; 语言在冲动中纵情恣肆, 具有释放压抑能量的狂欢性。

关键词: 文化批判; 专制主义; 湮没的辉煌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42X (2015) 05-0083-06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5.05.016

夏英勇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 一直坚持文化散文创作。主要作品有《湮没的辉煌》, 《旷世风华》和《绍兴十二年》。《湮没的辉煌》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创作时间跨度近20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尽管他描写的对象不同, 但是他的创作姿态如一, 始终是一个处在“江湖之远”的文化悲情主义者, 历史和现实的互动, 激发了他张狂地臧否古今历史的欲望和激情。他的激情和欲望始终如一, 坚持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专制主义。他以批判专制主义为己任, 并以此显示自己的文化自觉和品位。即使像《旷世风华》这样的指定的规定课题, 他依然不忘批判专制主义, 虽然有些地方有一点勉强, 但是这也正可以看到他的文化自觉。夏英勇是一个有脊梁的文化散文作家, 在他的面前, 许多扛着文化散文招牌的形形色色的伪文化散文作家都会显出奇怪的原形。

夏英勇早期致力于小说剧本创作, 著有小说《吹皱一池春水》、《巴黎女士》等。之后, 他从小说和剧本创作方阵中游离出来, 从事散文创作。这也是出于一种文化自觉, 即对文坛上充斥的小玩意、小悲欢、小家子气等的休闲散文的不满, “试图在自然、历史和人生的大坐标上寻找新的审美视点, 也寻找张扬个体灵魂和反思民族精神的全新领地”^①。他的散文创作的审美理想是“有黄钟大吕之响与惊涛裂岸之势”^②, 毫无疑问, 他的散文实

现了这一审美文化理想。

一、以“压抑”和“不平”建造“文化法庭”, 实现批判的自觉

夏英勇的散文对文化历史充满了激情, 这种激情来源于作者长期极度的压抑。他直率地宣告, 他“也许是被压抑得太久了”^③。压抑产生不平、产生冲动、产生力量。压抑有一个积累过程, 这种积累和他本人的经历、遭遇似乎并不密切。他处“江湖之远”, 和他的散文《寂寞的小石湾》中写的“小石湾”一样默默地生活着, 从“文革”到如今, 没有遭受过批判和迫害。他一直是一名普通文化工作者, 没有什么权力是非的漩涡折磨他, 但他有文化、有学养、有智慧, 也有良心和胆魄, 更重要的是他生活在现实之中。他审读历史、审读古今文化, 虽则没有像鲁迅笔下的狂人那样, 得出“吃人”的结论, 但他发现了历史上的是是非非中有太多的不平, 而这些不平又在现实生活中复活起来, 使他成了处“江湖之远”的地位上的文化悲情的主角。历史和现实的互动激活了他张狂地臧否古今历史的欲望。《湮没的辉煌》和《绍兴十二年》就是在这种臧否历史的欲望驱使下建造的“文化法庭”。在这座“文化法庭”里, 他时而担任法官, 时而担任控方, 时而担任辩方, 时而成为一个具有自由发言人身份的听众。不管他担任什么角色, 总是坚定地站在平民立场上, 决不当教师

* 收稿日期: 2015-08-10

作者简介: 范培松 (1943—), 男, 江苏宜兴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散文研究。

爷,一切以历史以文化为据,呈现出批判的自觉。于是纷繁的历史恩怨,到了这座“文化法庭”里,民族英雄史可法成了《沉默的小石湾》里的被告,面对敌军压境,他“不是在督师行辕里谋划军事,也不是在堞楼城壕边布置战守,而是召集诸将,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希望有一个人在最后帮助他完成大节,也就是把他杀死”。“仗还没有打,自己就先想着怎么个死法,如何全节……如何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文章最后的判决也非常严厉。这一抗战,由于史可法“太珍惜忠臣烈士的光环,他那种对千秋名节纯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眼前刀兵之争的创造性谋划”,正是统帅的悲观情绪软化了守城10万大军的脊梁,导致抗战失败。但审判到此没有结束,因为在和扬州一江之隔的小小县城江阴,一个没有科举功名的小小典史阎应元带领6万义民,面对24万清兵,居然坚守了81天,并且让对方付出了7.5万人的代价,和史可法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中外战争上的奇迹。可是这位小小的典史却被无情地埋在风干的青史之中。史可法死后封忠烈公,名垂青史;阎应元却黯淡无光,默默无闻,几乎为人们遗忘。这种死后哀荣的差异理所当然地由历史学家来承担责任,判决是无情的:历史学家从来就是一群浅薄而势利的观众,他们喜欢看热闹,他们的目光只盯着舞台上线条粗犷的动作,而对所有的潜台词不屑一顾。这是站在民间立场上的文化人对历史的宣判。

如果把夏坚勇的文化散文创作分为前后两期,他的批判目标不同。前期他把批判专制主义的目标指向朱姓的明朝,《湮没的辉煌》中的《东林悲风》是代表。后期的代表作《绍兴十二年》是把南宋小朝廷作为靶子。南宋小朝廷留在人们心中是个“苟安”的形象。“苟安”似乎和专制联不起来,恰恰南宋小朝廷是用“专制”创造了“苟安”的虚假繁荣,“苟安”的虚假繁荣背后是变本加厉的“专制”。正因为南宋小朝廷具有“专制”和“苟安”的双重品格,才激发了夏坚勇的创作激情。夏坚勇是50后的作家,按常理说,也是快要到“苟安”的年龄了,可是,他的生命是逆生长,气势充沛,生命力旺盛,又坚又勇。我始终坚持,散文贵有“气”,犹如人必须有气一样。气无形,却深藏于文内。散文要气韵生动,首先必须有“气”。夏坚勇的散文正如孟子所说,“善养浩然之气”,有一股“浩然之气”。这股浩然之气是从文

化批判中酿造出来,不中庸,不调和,不忽悠,以一种斗士的姿态,真刀真枪,把创造了“专制”的朱元璋、魏中贤、赵构、秦桧们钉到历史耻辱柱上。勃兴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散文之后走向衰老落,为人们诟病。但是,夏坚勇的文化散文却一枝独秀,坚持了文化散文的批判的真正品格,这一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个奇迹。

审判不是作者的终极目的,作者这样自述:“当我跋涉在残阳废垒、西风古道之间,与一页页风干的历史对话时,我同时也承载着一个巨大的心灵情节:抚摸着古老民族胴体上的伤痕,我常常颤栗不已,对文明的惋叹,对生命的珍爱,对自然山水中理性精神的探求汇聚成一种冷冽的忧患意识。”^④这种忧患意识正是一种批判的自觉,他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救赎意识,并贯串于他的文化散文的始终。他用文化散文彰显他的雄心,他想通过它来重塑人文精神。《东林悲风》是作者重塑人文精神的最优秀的篇章。本来东林党冤案似乎已有历史定评,迫害东林党的魏忠贤等人早已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似乎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但作者的忧患意识,使得他的目光定格在东林党冤案的形成过程中。东林书院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训导里,聚集了整整一代文化精英,他们探求、呼喊、抗争,保持着彪炳千秋的气节。但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文盲加流氓无产者的魏忠贤。魏先是用重金收买人暗杀东林党人,不成,便搜集东林党人的经济问题,又无果;而后就动用专政工具,把东林党的“六君子”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致死。更残忍的是,打手们用利刃将他们的喉骨剔削出来,烈火烧化,就美酒吞食。悲剧形成的过程,也就暗示了它的成因,是魏忠贤等人借助“至高无上的皇权”和“铁桶也似的专制模式”,胡作非为,才使得文盲战胜了精英——矛头直指专制的皇权。更深刻的是,作者还把审判的目光指向东林党人。东林党人面对残酷的迫害,或是以自杀报皇恩;或是在被捕后,民众闻讯,数万人奋起援救之际,肩披枷锁东躲西藏,逃避援救,“唯恐和逮捕他的缇骑走散,也唯恐失去自己身上的锁链”;或是在自尽时留下遗嘱,要家人典当器物,给执行逮捕任务的缇骑作回京的路费等等。面对这些仁人君子,作者一方面扼腕痛惜,另一方面又无情地揭示悲剧主人公“既是壮怀激烈的奇男子,又是愚忠循礼的士大夫”的矛盾性格。夏坚勇由此生发,描述了他们精神活动的意义

归宿，这一归宿是主体的空间，即把这群东林党人的文化品格以及他们生存的土地作一个总清理：东林党人以及他们生存的江南的市井巷间，“这是一块商风大渐，市民阶层开始显露头角的舞台。但刚刚萌芽的商品经济又深埋在封建经济的土壤之中，市民阶层的脚跟也相当软弱，他们只能附和在别人之中，隐隐约约地喊出自己的声音。对着皇权喊一声反，他们大概是想都不敢想的。他们只能枕着一块忠义石碑，在秀色可餐的江南大地上悄然安息”。这一清理似乎无奈地揭示了市井江南的文化只能培养出软弱的东林党人的必然性，这一必然性的偏颇却引起了人们的心理反弹：拯救自我、拯救大地应该引以为鉴，传统文化品格的缺陷不能让我们新一代文化人来继承，从这古老的历史故事中透露出现代人的气息，“我是我”的倔强才是最英雄的自救，在《绍兴十二年》中对岳飞的描写也孕含了这一意义。夏坚勇的文化散文的活力也正是表现在这里。

夏坚勇的文化散文坚持背靠历史，直面人生，直面现实。字里行间，始终让我们呼吸到的是现代的气息，听到的是时代跳动的脉搏声。要做到这一点，对作者来说，必须博古通今。博古不通今，文章呆而滞；通今不博古，文章浅而飘。我们读完他的散文，他对明史和宋史的研究的精和透，令人钦佩。更难得的是又能时时和当今社会进行观照，活学活用，显示了他对现实了解的深刻，古今交融，浑然一体。文中对朱元璋、魏中贤、赵构、秦桧以及大大小小的帮闲文人的描写和刻画，所显示的内涵，都富有现代意义。我们环顾左右，常常在生活中见到朱元璋、魏中贤、赵构、秦桧以及大大小小的帮闲文人留下的印痕，甚至有时在我们自己身上也会发现这些印痕。更精彩的是夏坚勇的叙述话语和画外音，融化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虽然他带着我们翻检历史，我们却感到亲切，他要借历史发声，把我们现实中的弊端揭示给我们看，使我们惊醒，思索，也让我们不由自主地会发出会心一笑。它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我们身上的污秽，也看到了社会的众生相，有一种厚重感。

二、古今时空交叉，以现代意识熔铸新的文化品位

夏坚勇的文化散文有一个创作惯性，即古今时空交叉。这种交叉基本上是两大类型，一类是从今起笔，如《东林悲风》，从东林书院的现实景致起笔，渐渐拉开东林党悲剧的帷幕。另一类是从古起

笔，如《绍兴十二年》笔墨对准绍兴十二年，纵的以编年史记述绍兴十二年里一年的时，尔后在横里大量穿插，形成纵横交叉。又如《小城故事》，一开始就把镜头对准冒辟疆，而后，在中间穿插才华横溢的同学A君（“文革”中因精神崩溃，吊死在水绘园对面的湖心亭），亦古亦今，古今交融。

夏坚勇通过古今时空交叉，集中表现两大母题：一是对皇权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如《绍兴十二年》《东林悲风》、《泗州钩沉》等；二是对文化人格（或商业人格）和官场人格矛盾的解剖，如《百年孤独》、《小城故事》等。当然，有的篇章是两个母题并存，如《走进后院》等。不管用何种时空交叉，也不管表现什么母题，有一点是坚定不移的：“试图在自然、历史和人生的大坐标上寻找新的审美视点，也寻找张扬个体灵魂和反思民族精神的全新领地。”^⑤新的审美视点正是以现代意识为标尺，重新审定历史，使得文集集中的历史成为作者张扬个体灵魂的一个全新领地，并由此熔铸出新的文化品位。

在亲近审视历史中，作家们常常会变成一个贪婪的收藏家，而后用“掉书袋”的方法再把收藏品肆意挥霍。夏坚勇为了避免这种挥霍，在创作中始终以“我”为中心，由“我”主宰一切，用“我”的现代意识审视历史，并引进行动艺术手段，对历史进行艺术再创造。如《泗州钩沉》中对明王朝大兴冤狱、诛杀功臣的极权专制主义的原因是这么描写的：

一个穷光蛋当了皇帝，首要的难题恐怕不是治国驭民，而是如何承受那种巨大的心理反差。这种反差甚至会整个地改铸他的人格走向，叱咤风云的伟丈夫变得怯懦宵小；阔大坦荡的胸怀塞进了猜忌、暴戾和险隘；谦和健朗的面孔浮上了贪婪自大的阴影。这是一种心理变态，从先前一无所有到什么都有了，一时反倒手足无措起来，巨大的既得利益令他眼花缭乱、心旌摇荡，却又唯恐受用不及，过期作废……^[1]

从古到今，这样解释朱元璋的专制心态，作者是第一人。现代心理分析使得作者深入到朱元璋的内心深处，把其变态的心理作一曝光。所描写的事实是历史的，但解剖的手段是现代的，避免了简单化的毛病，正是这种现代意识使这本专写历史的文集的文化品位具有青春的现代的气息。

这里牵涉到文化散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古今穿插交叉中是否可以写历史人物的文化心

理。夏坚勇擅长描写历史人物的文化心理。在他看来,以写历史人物为主的文化散文,文化心理的抒写是回避不了的。抒写人物的文化心理,既冒险又艰难。因为它非常容易给批评者扣上虚构的臭帽子。史书中是不大可能记载历史人物的文化心理的,但是夏坚勇以史书中的有案可查的事实作底,合情合理地写。在《湮没的辉煌》中,魏忠贤、东林党人,以及史可法等的文化心理写得非常成功。比如《寂寞的小石湾》里写史可法面对清的大军压境的文化心理,史可法想得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先想自己怎么个死法,如何全节,完成自己最后的造型。这个文化心理有史书对他的记载,以及他自己的奏章为依据。这个心理描写是对史可法持批判的态度来写的。读者还是认同的,至今我没有看到人和他来商榷。在《绍兴十二年》中,继续发挥他的优势,写赵构对岳飞杀与不杀的纠结的心理,写赵构“表面上不动声色,大部分时间都在复古殿里抄写《孝经》”,之后,如此写道:

《孝经》十八章,他每天抄写一章,从腊月十八日至小年夜,他已经抄了十一章。书法尚韵,韵其实就是一种风采,而笔下的神采是需要你静心守意地去经营的。可在这十一天里,他内心的纠结几乎可以煎熬来形容,有时有时写着写着,心绪便散漫了,以至写错了字,废了上好的绢素。

在这一节中,正面写赵构对岳飞杀与不杀的纠结的心理,抄《孝经》或许历史有记载,抄《孝经》写错字,估计不大可能有记载。但是这个细节恰恰显示了赵构在对岳飞杀与不杀的纠结的煎熬,因为书法时是必须静心守意。文章接着是大段大段地有层次地写赵构下决心杀,何时杀,怎样杀。用这样的细节形象展示,尔后自己站出来叙述。这种心理描写我是认同的,可能有的人会提出异样议,大家可以讨论。夏坚勇为在文化散文中描写历史人物的文化心理创造了有益的经验。

在文化散文创作中,更艰难的是如何描写一些永恒的母题,如夏坚勇为在文化散文中涉及的对文化人格(或商业人格)和官场人格的矛盾问题的剖析,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在困扰和折磨着文化人。他描绘和解剖了一批有这样矛盾人格的形象,有文化人格和官场人格矛盾冲突的文化人,如王念孙父子(《走进后院》)、冒辟疆(《小城故事》);有商业人格和官场人格矛盾冲突的文化人,如盛宣怀(《百年孤独》)等。文化人格(或

商业人格)和官场人格是既不能迁就也不能征服的永远难以解决的龃龉,和揭露批判极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相比,作者在态度、立场乃至语调系统上,都是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对待的。在批判极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上,作者站在对立位置上,控诉和鞭挞都明朗而坚定。但对待那些人格矛盾的人物,作者却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融进去,以宽容和理解为主,有时显得缺乏定见,态度暧昧。这在《百年孤独》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盛宣怀以走实业的商人形象走上中国舞台,但他的人格悲剧却是双脚踩在官僚和实业的两条船上,“在官僚面前,他是精明练达的商人;在商人面前,他又是手握权柄的官场”,这就成了盛宣怀的理想模式。他之后的成功,事业最辉煌的时期,恰恰是在官场失意之时。支撑他的李鸿章失势,使得他的商业人格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创办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煤铁钢联合企业、最大的纺织企业、中国第一家自办的电报局、中国第一家银行等等。但到1908年,他又卷进了政坛,被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后又晋升为邮传部尚书,跻身内阁,在喜忧参半中完成了向官场人格的倾斜。然而悲剧也正是从这里开始,辛亥革命发生了,盛宣怀被钉上了历史耻辱柱,他无法理解国人对他“卖国”的指责,最后只有怨愤和不平了。统观全文,和文集中那些以满怀极大愤怒批判专制极权的散文相比,作者在描述盛宣怀的人格忽而向商业、忽而向官场倾斜的过程时,克制、客观,态度也比较暧昧,时而欣赏时而惋惜时而同情,连同《百年孤独》的题目也是一种暧昧,没有鲜明的倾向显示。其他同类题材如以表现文化人格和官场人格摩擦的《走进后院》也处在暧昧的主宰下,这和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余秋雨坚决地认为,苏东坡正是从官场中突围,才完成了文化人格的升华和完美,余秋雨着眼的是苏东坡在两种人格冲突中的痛苦,对官场采取“斥”的态度,而夏坚勇则是更多地看到两种人格之间的另一层联结,这种联结使作者对官场人格采取“容”的态度。在《小城故事》中写冒辟疆晚年对官场心态的变化,从原来对清朝抱“不入试、不应召、不做官”的“三不主义”,变成热切希冀子孙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为孙子谋一顶乌纱帽,需要活动费,他不得不到处告贷。对此作者都不忍心发多少刻薄议论,因为他理解,在中国,“不当官,你纵然有盖世才华,满腹经纶,也不能像人家那样活得潇洒滋润”。在这一点上,恰

恰又是当今市场经济中流行的一种现代价值趋向，作者对此虽然不一定百分之百地认同，但多少也有一点无奈的默认。用暧昧来处理“文化人格”、“商业人格”和“官场人格”的矛盾，体现了作者对文化品位的另一种现代解读。

三、语言在冲动中放纵，具有释放压抑能量的狂欢性

长期的孤独和压抑，使作者把散文作为释放能量的一个场所。为此，夏坚勇的文化散文充满了生命的热度。作者在历史和现实之中，天马行空，穿梭往来，大幅度跳跃，但我的心始终留恋现实，谈古是为了讽今。因此在对历史叙事时，他担忧冗长的历史叙述会使文章情感冷却，变成考古学家的枯燥的学术论文，就频繁地用现实中一代人所熟悉的滚烫语言穿插其间，为整个叙述加温，提升情感的热度。如《东林悲风》中描述皇帝迫害东林党的始末，叙述到事情起因，东林党人周宗建上疏究论权阉魏忠贤“千人所指，一丁不识”时，作者劈头第一句就是“事情的起因似乎是关于外行能不能领导内行”。用这样一句在当代使多少知识分子蒙受灾难的胆战心惊的话引发叙述，一下子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情感跟着升温。接着写皇帝下决心镇压东林党人时，对皇帝的心态如此刻画：“可怕的倒是那些抱成一团的文化精英，你看他们振臂一呼，朝野倾动，呼朋引类，议论汹汹，这帮人究竟意欲何为？难道寡人的宫阙也成了他们恣肆纵横的书院不成？得，我且小试刀锋，镇一镇他们的气焰。就是刀下有几个冤鬼，大不了过些年再平反昭雪，给他们立个忠义碑得了。”巧妙地用专制主义者的内心独白方式，把他们肆意践踏文化、凌辱人权的恶毒品格曝光，语调的轻佻，更增加了悲剧的内涵。最后引用史料，叙述镇压东林党人的结果时，完全以今人熟悉的语言感叹说：“这样的处理似乎还比较文明（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只是给你一点名誉和人身自由的损失。”语言使现实和历史的界线模糊，把历史和现实提到一起，更加增强了情感的沉重性。

在释放压抑的能量中，作者还能注意轻重缓急的节奏，并不是一味轰炸，用高八度的迷狂语言倾泻自己的情感。在总的语言处理原则上，大致是叙述事实，尽量克制，以平稳的语调加以展现；至多运用一些讽刺、反笔、调侃等手法，为史实增添一点诸如幽默等色彩。但到关键时刻，悲愤不能自制之际，作者就不顾一切，自我放纵，尽情释放，嬉

笑怒骂，在狂欢中获得快感。当写到魏忠贤等居然把东林党人打死后，用利刀剔割喉骨，烈火烧化，煮酒吞食时，作者愤怒至极：“这是一群没有文化底蕴的政治流氓，一群挤眉弄眼、捏手掐脚的泼皮无赖，一群得志便猖狂，从报复中获取快感的刁奴恶棍。”一连串的排比，肆意发泄自己的冲动，达到一种谴责的狂欢。

得心应手地放纵自己的冲动，还表现在他善于变腔变调，以异己的虚拟化抒情语言，模仿被讽刺的对象，肆意抒情，这又是另一种释放压抑的方式，突出地表现在《走进后院》中，揭露清王朝“文字狱”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柱楼诗集》案上。作者在叙述时完全站在异己的乾隆立场上，虚拟了一连串抒情语言。当乾隆要对《一柱楼诗集》开刀时，文中写道：“作者是个举人，又恰恰发生在人文荟萃的江苏，拿来开刀，且杀他个桃红柳绿杏花春雨，给江南的才子们一点颜色看看。此案中又有官吏包庇的问题，这更合朕意，一并杀将过去，让封疆大吏们清醒清醒，看他们以后还敢空言塞责！”把人命当作儿戏的专制主义者，政治目的明确，故意制造冤案，用他人的脑袋强化他的极权。但是冤案制造还有难度，因为拥有《一柱楼诗集》的徐家是主动呈书在前，他人告发在后，根据乾隆查办禁书的谕旨，只要主动呈书到官，可免于追究。但到了乾隆那里，作者又虚拟了乾隆的抒情语言：“鸟用！谁先谁后，那只是枝节问题，无须纠缠。乾隆问道：为什么早不自首晚不自首，在知道人家要告发时才去自首？可见是存心匿书不报。”于是，徐家自首无效。专制极权主义者的为所欲为的肆无忌惮的腔调，又为冤案的悲剧气氛加添了催化剂。事实总归是事实，《一柱楼诗集》毕竟是几首吟风弄月的情怀小唱，但这位穷凶极恶的乾隆内心独白是：“屁话！吟风弄月中难道没有政治？且看这两句：‘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这‘明朝’就不消说了，自然是指朱明故国。（果真不消说吗？）至于‘去清都’，乾隆又问道：为什么用‘去’，而不用‘上’清都、‘到’清都呢？‘去’就是除去，就是反清复明，用心何其险恶！”一桩历史上罕见的文字狱就这样出笼了。虚拟富有层次感，从意图到立案到定案，层层递进，把极权者的暴虐心理彻底曝光。虽则是虚拟，但作者很自信，因为有他的研究以及所掌握的史实作为后盾。这种以虚拟讽刺对象的独白进行抒情，可以使叙述手法多样化，避免单调，加强艺术效果，同

时也可以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古今制造文字狱冤案的专制极权主义者的恶毒心理和手法,用它来警示后人,避免悲剧重现。虚拟讽刺对象的抒情语言,目的是为了纵情,而纵情的目的是为了从历史回到现实,文集的魅力也就在于此。

夏坚勇的文化散文很有味。散文讲究味。周作人在评论俞平伯的《燕知草》时提出散文要有“涩味与简单味”。人们并没有重视。现在有论者非常强调味,认为“味”是现代散文的标志。现在看看许多无味的散文泛滥,才知道“涩味与简单味”是多么稀罕。不过,夏坚勇的文化散文味很怪,它居然和政治密切相关。文学艺术应该是以美取胜,一说到政治,我们就会联想到文革的致敬电之类的作品,让人生厌,但是夏坚勇文化散文里的有谐趣有滋味的地方,恰恰都或多或少和政治有关。以《绍兴十二年》为例,我粗略统计一下,

和政治有关的话语有 123 处之多,基本上是他直接站出来,面对读者进行指点。这样的话语不能称之为纯政治话语,我给他命名为“智慧的文化政治话语”。它给散文增色增味。我们读到它,常常会心一笑,或者拍案叫好,或者猛然惊醒。这些文字肩负了重任,表明夏坚勇在他的文化散文里实现了文化自我的狂欢。现在的散文要实现文化自我就非常难,要文化自我狂欢更是难于上青天,夏坚勇做到了,他有理由自豪。

注释:

①②③④⑤夏坚勇:《〈湮没的辉煌〉自序》,《湮没的辉煌》,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第 2-3 页。

参考文献:

[1] 夏坚勇:湮没的辉煌 [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259.

The Forming of New Cultural Spirits through Cultural Criticism —On the Prose Art of Xia Jianyong

FAN Pei-song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history, facing the reality, Xia Jianyong's proses set up the “cultural court” to make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folk view. He is a culturally pathetic prosier. In the aspect of arts, his proses form a new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aste with modern ideas through the overlap of ancient and modern spaces. The language is reckless and rhapsodically in order to release the oppressive energy.

Key words: cultural criticism; dictatorship; buried glory

(责任编辑:朱世龙)